

从冬季走向春天的文学

——论新时期伤痕文学(一)

高城英

所谓“伤痕文学”是指1978年到1980年在中国文坛上涌现的描写一幅幅十年浩劫时期的生活图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文学思潮。其代表作品有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登载的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以及它以前和以后发表的刘心武的《班主任》,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莫应丰的《将军吟》,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曹鸿骞的《命运》,中杰英的《罗孚山血泪祭》,冯国才和徐培东的《我的罪过》,汪凯利的《谁杀了她》,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等。它的名字也是从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得来的。伤痕文学的出现,标志着束缚作家的极左思潮得到了解除,现实主义传统得到了恢复,其意义仅亚于1919年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可以和1942年的延安文艺整风运动比美。

理论建设的新时期

一种新的文学样品出现了,它也和科学上的新发现一样会吸引很多人殷勤追踪,仔细地研究它的结构、原理、特征、意义及发展趋势,使之成为一种完美的学派。新时期的文艺理论家们面对生活,从实践出发,对各个不同时期的文艺理论现象清理的同时,充分肯定了新时期的所谓“伤痕文学”的存在的合理性。他们先是对三、四十年代许多未曾澄清的“文艺为什么服务”的问题,“文艺的阶级性”问题,“文艺的人性论”问题,文艺的主体性和客观性问题等,进行了重新思考和研究;接着又对解放后十七年文

艺为政治服务,“写中心,唱中心”,歌功颂德等问题进行了重新认识;最后还对“四人帮”鼓吹的阴谋文学、瞒骗文学、“高大全”文学、“三突出”文学,以及根本任务论、题材决定论、彻底扫荡遗产论给予了严厉的批判。然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指导下,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倡导下,提出了在广阔领域里“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针,文艺开始了从寒冷的冬季走向温暖的春天的复苏。但理论上的问题并不象实践上的问题那样来得直截了当。由于各家各派所持观点不同,再加上旧有理论的保守性和顽固性,要形成共识是需要时间的,于是新时期文学开始不久又出现了三次较大的争论。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悲剧的争论。

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登载了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谁也没有想到,有人竟用“伤痕文学”,“感伤文学”,“暴露文学”,“批判文学”,“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来概括当时文学创作的基本面貌。尽管这种说法并无科学依据,也都带点贬义的斥责,但这种说法却提出了一系列带理论性的严肃问题:社会主义有没有悲剧?可不可以写社会主义悲剧?怎样表现社会主义悲剧?这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早在1933年卢那察尔斯基面对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联就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存在悲剧,而且应该存在悲剧,因为“新时代的悲剧家要描写新社会的诞生的苦难,歌颂我们斗争中的牺牲者——这无疑是现代悲剧的首要任务和良好基础”。有悲剧,我们的作家为什么不可以写呢?一切勇于

直面人生的人,他们不仅能看到为开拓新生活而奋不顾身的牺牲者的丰功伟绩,而且也不会象阿Q那样忌疾讳医,惧怕揭出自己身上的痼疽。何况悲剧也不是只有一种模式,它的价值和效果可能是完全相反的:一种是消极的悲剧作品,正如高尔基说的“没有在生活中增加了积极性的东西,反之,因为它只强调生活中的消极方面,便使得消极的东西根深蒂固在人类的记忆里,而且常常把人描写成在黑暗势力的混乱中束手无策,所以可能引入陷入悲观主义、神秘主义等等”;一种是进步的悲剧作品。这种作品通过伟大的、正义的或具有正面素质人物的不幸、痛苦和灭亡,来颂扬人们为追求美好生活和正义事业的斗争,赞美正面人物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理想,使读者在悲痛中获得精神上崇高的美感。这种悲剧作品,往往具有比正剧作品更为深刻、动人的艺术力量”^①。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大多数是属于后一类的悲剧作品。它们虽然写了“文革”时期个人和家庭的悲剧,触及了社会主义社会确实存在的阴暗面,展示了十年浩劫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和严重创伤,指出了我们制度上的缺陷,工作中的失误和党内的种种不正之风,很有感伤和悲哀的嫌疑。然而,它写肉体上的伤痕是为了早日康复,它写灵魂上的内伤是为了开掘健美的血肉和生机,它暴露黑暗是为了战胜光明,它的宗旨是为了引起疗救者的注意,促人奋发。郑义在写完他的习作《枫》以后公开承认“悲剧当然要悲,我不回避压抑、痛苦。痛苦使人深思,压抑产生反抗。我们需要的是经过读者沉思,然后发自心底的力量。悲剧的巨大社会意义,不在于灌输虚劲,给人们以光明的安慰、廉价的精神胜利。恰恰相反,它的作用在于促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产生悲剧的社会根源,由此而激发巨大深厚的斗争力量”^②。“伤痕文学”中流露一些感伤、悲哀情绪,这并不等于感伤主义和悲观主义。前者是一种感情的流动,是暂时的,偶然的,是情感世界的产物。那后者则是人们观察世界时产生的一种理性思维,是一种世界观,它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永久性。在后者看来,人生永远植根在痛苦之中,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就是你永远得不到的:不要出生,不要存在,化为虚无。而对

人来说,不得已而思其次,就是早死”^③。这种观点显然与“伤痕文学”扯不到一块。相反,“伤痕文学”与利文斯顿在《论希腊文学》中评价希腊悲剧作品时说的一番话比较接近。他说:“只有少数的人才有足够的才能去描写苦难和邪恶而不丧失坚定的信念,除了纯粹的可怖以外,还能写出其他的感情来。这就可以解释伟大的悲剧何以这样难得,产生伟大的悲剧似乎有一个条件,就是他应当忠实地表现生活中最阴暗的东西,同时又不会在最后让人感到沮丧压抑。”^④可以说,我们看到的一些优秀的伤痕文学作品与古典悲剧作品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新时期伤痕文学虽然描写出了人们在黑暗势力摧残下的累累伤痕,但大多数都写出了乌云驱散以后的扬眉吐气,皆大欢喜。《命运》(1978年《安徽文艺》第三期)中的主人公操志强读中学时年年都是三好学生,恢复高考时成绩也是全县第一,可是在林彪、“四人帮”的淫威下,在“白卷英雄”反潮流的年代,他上大学深造的机会年复一年地落空了,长期受压抑、埋没。这不仅尖锐地揭露了林彪、“四人帮”肆虐时期大学招生考试的一些内幕,控诉了操作人事大权的地头蛇沈家友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媚上欺下的行径,也写出了操志强的耐心和虔诚等待终于有了出头的一天——“四人帮”被粉碎了,他堂堂正正地上了大学。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虔诚的被愚弄和正义的死亡,而是只要我们的祖国永远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道路前进,我们每个人的前途是辉煌的。还有不少的“伤痕”作品,塑造了不少在逆境中搏斗,宁折不弯的人物形象。《神圣的使命》就是把歌颂和悲剧放在一起的。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一位无产阶级的公安战士,他在逆境中顶着“四人帮”的高压,克服重重困难,为白彘的冤案调查奔走,鞠躬尽瘁,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最后在“四人帮”的爪牙徐润成和裴发年蓄意派出的吉普车的车轮下,以身殉职。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在“四人帮”为害期间许多主持正义、为民请命的革命老干部的优秀品质。他虽然牺牲了,但他的死悲而壮,慨而慷,具有一种撼人的艺术力量。更为可贵的,在“伤痕文学”中有不少作品不仅写了人们的不幸,而且由衷地歌颂了人民在动乱岁月中表现出来的美好情操。《从

森林里来的孩子》中的那位老音乐家梁启明“文革”时被无端指控为“黑线人物”，流放到遥远的森林伐木队劳动改造，“四人帮”和癌病无情地夺取了他的生命，可是他在森林伐木队的时候，始终把自己的生命当作大森林里的泥土，年年月月养育着绿色的小树，而将他的精神和艺术活活泼泼地、充满生机地、顽强地、奋发不息地在一个森林里的孩子身上延伸下去。而那个叫孙长宁的孩子呢？在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时，他抱着“必须把梁老师没有说完的话，没有做完的事，一生一世地永不松懈地继续下去”的决心，报考音乐学院，轰动整个京城，被破格录取。为人民，为祖国，为神圣的艺术，他们带着冤屈，带着才华，带着坚贞无私地奉献，顽强地拼搏，终于迎来了美好而晴朗的早晨，这是多么可贵的情操啊！这些作品它们能够将伤痕描写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结合起来，同对美好事物的追求结合起来，充满鼓舞人的道德力量，给人以健康的审美情操教育，这又何“伤”之有呢？人民正需要这样的悲剧作品。

第二，关于文艺“向前看”还是“向后看”的争论。从1979年4月5日《广州日报》发表王安思的《向前看啊，文艺》开始，陆续提出了文艺“向前看”还是“向后看”的问题，将“四人帮”荼毒下产生的社会问题的作品、诉说“四人帮”肆虐下个人和家庭悲惨遭遇的作品、描写人民大胆反抗“四人帮”法西斯专政的作品，判定为“向后看的文艺”，接着指出“提倡文艺向前看的口号，提倡向前看的文艺”。根据他的说法，作家们不能写今天以前的历史题材，而只能写眼花缭乱的今天和不着边际的明天。这种观点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文艺理论界和作家们一致的批评，大家都认为这样给文艺分类是不科学的，也是毫无意义的，它不仅割断了历史的延续性，而且也是在划地成牢、作茧自缚，限制了作家们选材的视野，不利于文艺的发展。在争论中“伤痕文学”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第三，关于“歌德”与“缺德”的争论。1979年6月《河北文艺》发表了李剑的《“歌德”与“缺德”》一文，提出“现代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杖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汉轻轻扣门。河水涣涣，

莲荷盈盈，绿水新地，艳阳高照。当今世界如此美好的社会主义为何不可‘歌’其‘德’”？同时又暗中指责那些揭露“四人帮”倒行逆施、造成人们心灵严重创伤的作品有“缺德之行”。这种论调既背离了当时严峻的形势，也不符合文学艺术的理论原则。文学艺术从来就有认识、教育、审美和宣泄各方面的作用，它需要美容，同时也需要治病，不可能只有美容师的一种作用。那些专门写“归马华山之阳，放牛桃林之野”的作品，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即所谓“歌德”文艺，只能起到简化现代人的头脑和麻醉人的灵魂的作用，决不可能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四化”建设有什么作用。

随着党的文艺政策的落实和文艺理论上的明晰化，作家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文艺生产力得到了空前大解放，题材扩大了，主题深化了，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不断创新，文艺界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伤痕文学的新成就

（一）题材的拓展

文化革命期间，由于极“左”思潮统治各个领域，再加上“四人帮”和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的挑拨煽动，几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都受到了牵连，心灵深处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一些创伤。地富反坏右分子不必说，他们的子女也被说成“黑五类”，受到社会歧视。家庭出身好的革命领导干部有的因为派性斗争而被打成“走资派”，他们的子女也便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心里憋着一股闷气。一般的普通群众先分成两派：“造反派”和“保皇派”。开始是“保皇派”受到围攻，接着又是因为“造反派”中的一部分与“五·一六”有瓜葛而受到审查。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几乎没有几个好人了。人们心理普遍感到无所适从，困惑不安，岌岌可危。文化革命结束以后，“四人帮”被赶下了历史舞台，人们回顾过去那段苦难的历程，常常是浮想联翩，夜不能寐，都想寻找宣泄的机会，求得心理平衡。我们的文艺家们便拿起了那枝久已搁置了的笔，用文学的形式反映那个时代，暴露“四人帮”横行霸道造成的人们心身上的累累伤痕，展示人民群众艰难求生、顽强斗争的风貌，这便成了

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和革命责任。

1、知识分子题材小说

文化革命是从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开始的，这时知识分子的命运风云变幻，最为凄惨。他们的爱情、婚姻、家庭和个人的前途，几乎都被文化革命这个魔鬼弄得乱七八糟，一团漆黑。中杰英的《罗浮山血泪祭》使我们看到了北京某大学的专家、学者、教授、科学家无限制地流徙、充军，生命带着发明创造一起送上政治祭坛的惨重事实，展示了一幕幕“才华翻作罪恶，年华囚之铁锁，勤劳被判死刑，善良送进地狱，人类的一切良知钉在十字架上，有功于世的鲜血泼到化粪池里”^⑤的恶作剧。陈国凯的《我怎么办》则从爱情、婚姻、家庭这个特殊的角度反映了知识分子左右为难的窘境。作品中的主人公薛子君大学速成班结业后，分在一家机械厂当技术员。一次到外省实习时结识了一位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才生李丽文，组建了一个令人羡慕的小家庭。1967年“文革”开始“文攻武卫”、“全面内战”时，两派进入了莫名其妙然而又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时他们正在度蜜月，并怀有婴儿，突然阴影笼罩到他们头上。离分娩不久了，薛子君到李丽文那里去探亲，结果专案组长告诉她：“你丈夫是一个十足的‘反革命分子’，他攻击造反派，攻击红色政权，还胆大包天整我们的材料，他已经落到可耻的下场。你要见他么？可以。”然后拿出一包东西扔给她：“不过，你来晚了一步，这个‘反革命分子’已经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了……。”无奈，她回到家里（她住在姑妈家），姑妈（工程师）又突然成了“特嫌分子”，回到厂里设计组，设计组的负责人说她不适合在这里工作了，叫她去扫马路。她没有了家，也没有了工作，只好漫无边际和目的的在街头徘徊，终于来到江边，带着尚未降生的胎儿扑向了江中……。一个当工人的老同学将她从江中救起，后来结了婚，她不仅有了栖身地，而且生活也有了一些起色：她在丈夫厂里当了临时工，夫妻相敬如宾。可是1976年全国又刮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刘亦民又因为参加了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而被捕入狱，她又成了挂在墙上的乌龟，四脚无靠了。1979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刘亦民得到了无罪释放，这本来

是个大喜的日子，可是突然一位头发花白、脸上一道道伤痕、上嘴唇皮裂开了的男人撞进来一头扑到她的怀里哭起来：“子君，我是丽文呀！”面对家里的两个丈夫，薛子君的心一下子撕裂成了两半：“天那，我应该怎么办？”同样，李丽文和刘亦民也存在“我怎么办？”的问题。究竟怎么办？即使是思想家、法学博士恐怕也难以回答，任何人也不可能采取柳妈说的阎王爷的办法，将薛子君锯成两半，每个男人分一半。这些人物的命运为什么这样悲惨？他们已经受够了命运的作弄，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责怪他们呢？我们所能诅咒的恐怕也只有那个残酷的现实，是残酷的现实使得他们左右为难，走投无路，无所适从。随着现实的发展变化，他们的命运也许会更好起来的。

2、知青题材小说

新时期一开始知识青年出身的作家描写我国6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运动的小说就大量涌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作为解决暂时困难的一种措施，本来也无可非议，但它在实施过程中又牵扯了许多政治性事变，带有“充军”、“流放”的性质，因而知识青年的政治压力很大，思想包袱很多，处处感到一种莫名的歧视的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大多数都回城了，但又增加了一些隔世之感和失落情绪，对那些失去了的年华、爱情、婚姻和就业机会感到一时难以填补，心理总不平衡，急于把那些压抑情感宣泄出来，这便成了知青小说的重要特色之一。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就是这类最早的知青小说。主人公晓华出身革命干部家庭，后因妈妈无端地被打成叛徒，为了和妈妈划清界线，她抱着一颗纯洁的心提前毕业，告别上海，加入了“上山下乡”的大军，在辽宁的一个农村扎了根，一直过着孤苦而又寂寞的生活；在知青生活中，她得到了贫下中农和同伴的慰藉和帮助，当了民办教师，有了自己的男朋友，可是又由于妈妈的叛徒身份而影响了男朋友的提干，只好又含泪将自己已经到手的爱情和幸福掷开，把自己的心扉重新封闭起来；粉碎“四人帮”以后妈妈的叛徒问题落实了，得到了平反昭雪，恢复了工作，可是又因为妈妈被折磨得不行了，在大年除夕之夜死在

医院里,最后连见可怜的母亲一面也不可得,留下终生遗憾。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在“四人帮”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下的累累创伤,而且也看到了年轻一代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摧残下心灵上的创伤。比较起来,心灵上的折磨比肉体上的摧残要难受得多。看看祥林嫂怎么死的,也许可以增加对这方面的了解。祥林嫂在物质方面,可以说没有受到鲁四老爷怎样的虐待,可是鲁四老爷一旦剥夺她的劳动权利,禁止她参加神圣的祭典,她的精神一下子全部崩溃了。“四人帮”对人的摧残主要也在精神方面。这小说虽然流露了较多的感伤、悲哀情绪,但它对罪恶势力的血泪控诉是很有悲剧价值的。

知青小说,随着批判“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深入开展,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向前迈进,开始由“时代的控诉”转向“命运的描述”,由“个人的遭际”转向“历史的反思”。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就是在这一发展历程中出现的“又一村”。这篇小说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以扣人心弦的曲折的爱情情节,成功地塑造了两个出身不同,然而又都饱经风霜、不失理想追求的知识青年。柯碧舟是一位很有才气和抱负的知识青年。他出身“历史反革命家庭”,因此在知青点上也成了“内控对象”,受尽了白眼、蔑视、讥笑,甚至侮辱;他爱好文学,偷偷写作,却被扣上“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帽子;他为人打抱不平,勇抓扒手,却被一伙流氓打伤,抢走财物;他与出身高干家庭的杜见春相爱,又被讥笑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生活虽然蹉跎,但他在贫下中农帮助下,将自己融合在集体中,一心一意开创属于自己也是属于集体的事业:带领大伙卖竹造纸,为集体增加收入;四处奔波,为队上安装小水电站;勤奋写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爱情出现新的波折时,又能舍弃爱情而追求新的理想……。比较起来,另一位知识青年杜见春经历的思想矛盾更复杂一些。她出身正师级干部家庭,从小就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在一般人看来,展现在她面前的完全是玫瑰花朵一样的艳丽色彩。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突然她父亲被指控为“漏网走资派”。接着保送上大学的资格取

消了,自己成了被强迫“劳动改造”的对象,甚至还遭到造反派的人身侮辱。后来父亲恢复了正师级干部的职务,可是她跟柯碧舟患难与共的爱情又出现了新的阴影,遭到父母亲的反对……。好在她自己还坚硬,并没有将自己的命运跟着父母亲的命运转动、碾碎,终于牢牢地把握了自己的命运,和柯碧舟结合在一起投入到了移风易俗、改天换地的伟大行列。柯碧舟和杜见春都是属于受“四人帮”的“血统论”荼毒的知识青年形象,所不同的就是他们能够在逆境中奋起,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人民和集体联系在一起,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争取自己的幸福。他们是属于反思和开拓的一代知识青年。所以他们比一般知识青年形象具有更加撼人的艺术力量。由此,知青题材的小说也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3、军人题材小说

过去人们普遍认为人民军队内部是一片神圣的净土,决不会有什么矛盾、冲突,更不会有什么冤、假、错案。可是在文化革命的混乱中军人也受到冲击,将军充军,军官蹲监狱,战士受审查,也屡有发生。《小镇上的将军》真实地反映文革时期军队老干部的特殊遭遇。作品的主人公将军在文革不久就被打成“叛徒”,充军到一个小镇。来镇以后,他为救助一个小孩危难的病情,得罪了镇长太太,坐镇政府的吉普车去军医院看病的“优惠”待遇被取消了;又因为悼念周总理逝世,和镇长发生冲突,惹下了一身麻烦,气死在小镇。将军,作为立下汗马功劳的将军,他没有捐躯沙场,却受到小小镇长的管制,死于非难,这本身就是极赋讽刺意味的一幕。将军死后,小镇复活了,那象征着将军“老皮斑驳、雷轰了顶”的老樟树,根不死,并且发出了“碧绿鲜亮的新枝新叶”,无疑显示了将军的伟岸和崇高。这篇小说按照作者的讲法,他是要写出“从周总理到陈总、贺总、彭总,许许多多曾经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紧跟毛主席南征北战、叱咤风云的一代雄杰”^⑤是怎样受林彪、“四人帮”法西斯专政的迫害的,表明自己的愤愤不平。这个作品在艺术上也为后来冲破军事文学“无冲突论”的老套,大胆而不失分寸地揭露军队的各种矛盾的作品开了先河。(待续)